

政策理论学习参考

2020 年第八期（总第八期）

党委教师工作部编 2020 年 8 月 11 日

为深入学习陶德麟事迹，现辑录了相关社评文章，供各单位教师政策理论学习使用。（其他专题学习参考可浏览网址 <http://rsgl.jlu.edu.cn/jssz/jypx.htm>）

目 录

第一节 陶德麟简介.....	1
第二节 教育部追授陶德麟同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2
第三节 追忆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	12
第四节 我还愿意做一名哲学教师.....	20
第五节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他走了.....	23
第六节 爱智求真与现实关怀的高度统一.....	28

陶德麟简介

1931年10月生，湖北武汉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5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留校任李达同志学术研究助手。1956年在《哲学研究》上批评前苏联《简明哲学词典》的论文受到国内外高度重视。1961年李达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时，为主要执笔人。1978年积极投入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刊发表《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等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论文。同年受人民出版社委托修订出版李达同志生前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与他人共同编辑出版四卷本《李达文集》；任《中国大百科全书 哲学卷》总论及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1984年被国家人事部授予首批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2020年5月24日在武汉逝世。是我校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博士点和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人，被同行专家评价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1985年起先后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和召集人，全国普通高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专家组(哲学)召集人，国家社科“七五”、“八五”规划哲学组成员和“九五”、“十五”规划哲学组副组长，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哲学教材组主要成员、美国依阿华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国际顾问等兼职。论文《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一等奖；作为第一作者的《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主编的《社会稳定论》获中国图书奖。

来源：武汉大学官网

教育部追授陶德麟同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新闻网综合消息 日前，教育部追授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科研工作者向陶德麟同志学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四有”好老师，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陶德麟同志生前系武汉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2020年5月24日因病逝世，享年89岁。

陶德麟同志忠诚于党，毕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将一生心血奉献给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方面贡献卓著；他身体力行，坚守一线立德树人，长期为本科生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将深切的家国情怀贯穿教书育人始终，用丰厚学识和人格魅力影响学生，让学生感悟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他严谨笃学，时刻站在知识发展前沿刻苦钻研，编著教材著作20多部，发表论文200余篇，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他师德崇高，呕心沥血育人治校，从教60多年，始终以仁爱之心培育和成就学生，年逾古稀依然逐字逐句指导学生论文，时常工作到深夜，以高尚的师德风范深受师生爱戴。为表彰先进典型，弘扬教育报国精神，教育部决定追授陶德麟同志“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教育部号召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科研工作者以陶德麟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绝对忠诚、爱国奋斗的崇高品质，学习他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赤诚情怀，学习他立德树人、关爱学生的高尚师德，从本职岗位做起，刻苦钻研、奋发进取，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毕生追求融入到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中，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心融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才智和力量。

附件：

爱智乐学师道真

——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同志先进事迹

2020年5月24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德麟同志，因病逝世，享年89岁。

陶德麟同志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把一生心血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他先后出版由他执笔并修订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与真理——认识论研究》等著作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论著曾获国家教委首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教委首届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六届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宣部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多种学术奖励，入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人文社科类图书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他于1984年由国家人事部授予首批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省劳动模范”称号，2009年入选湖北省“新中国成立60年功勋人物100人”和“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湖北三十人”，2010年入选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

一、明道信道信仰真，一生探索，执着追寻真理之光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作为传道者，教师首先要做到自己明道、信道。新时代中国教师应明之“道”、

应信之“道”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提到的“立德树人”之大“德”。

陶德麟同志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幼年未上小学，而是在家由父母和学者陈炳文、杨相霖先生授课。他的父亲是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参与者，后因保护被通缉的共产党员、力主国共合作抗日而不见容于当局，愤而退出国民党，五十多岁就困厄病逝。

时局的动荡和父亲的境遇，激发了少年陶德麟对国家命运和人生道路的深深思索，他经常在周记中抨击时局、力图探寻民族发展进步之出路。中学期间，他已经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等著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彼时的他，尽管在胡适讲演《两个世界，两种文化》的现场不赞同其政治观点，但苦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来说服自己。直到他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批判的武器，才照亮了心中那条一直苦苦追寻探索、指引人生的道路。

1949年，陶德麟同志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除专业学习外，他选修了一些哲学类课程，自学了《资本论》第1卷。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哲学系教师，并兼任李达的科研助手达13年之久。几十年后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李达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李达对陶德麟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饭碗，而是武器。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能像摆摊子的小贩，天气好就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摊子。”“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言行一致，决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

“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是所有科学中的首席科学。”李达的肺腑之言和言传身教使陶德麟同志深深感动和折服，也激励着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事业奋斗终身，虽九死其尤未悔。

1961年8月，李达接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任务，指定由陶德麟执笔。在李达指导下，经过4年努力，他于1965年冬完成了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正当他继续编撰下卷《唯物史观》时，“文

化大革命”爆发，陶德麟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斗、侮辱和劳动改造，几次遇险，命悬一线，家人也遭遇牵连。这期间，他身心饱受摧残，还落下了失眠的老毛病。

然而，强大的信念支撑住了他。他坚信，人民不会听任国家就此沉沦，党中央不会放任宵小之辈猖狂横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不会就此黯淡。1974年，在风雨如晦的暗夜，他写下一首小诗，满怀期盼，静待黎明：“临歧自古易彷徨，我到歧前不自伤。心境长随天上月，如环如玦总清光。”

“文革”结束之后，陶德麟同志怀着满腔热诚，迅速投身于党的理论事业当中。1978年，他全身心地参与了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充当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急先锋”。与此同时，他遵李达遗嘱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被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他主持编纂出版了四卷本《李达文集》，并较系统地探讨了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杰出贡献，把李达思想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撰写了多项重要条目释文；他还主持编写了多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0年初，在患病住院之际，陶德麟同志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发表了题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访谈文章，深入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前提、原则以及旨归等重大理论问题。他说：“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在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是中国社会的实际，所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服务的。”

武大哲学系毕业生、原党委副书记骆郁廷教授说，“陶先生追随真理之心不曾动摇。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

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有此情怀。”

二、立德垂范品行正，一生坚守，以身示范师表之道

近代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主张教师“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修养到不愧为人之师表的地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师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从1953年执教到2018年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岗位上退休，陶德麟同志在武汉大学工作达65年之久，历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武汉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和校长等行政职务。在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研究、人才培养和管理工作中，他表现出非凡的人格魅力和高尚师德。

他淡泊名利，公正无私。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知名专家，他曾经长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首届主任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和哲学学部召集人、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哲学学科评审组副组长、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哲学专家组召集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评审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在所有这些评议或评审会上，陶德麟同志给多次共同参加会议的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刘放桐留下了“公正无私、认真负责、顾全大局、诚恳待人”的强烈印象。他从未发现陶德麟“为了使他熟悉或受托之对象通过而说项，也未发现他阻扰对他可能不友好的对象通过。他总是能超越个人或单位的利害的界限，坚持评审的规则”。

他胸襟广博，雍容大度。“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走上武汉大学主要领导岗位，但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对“文化大革命”中“整”过他的人打击报复。相反，他对在政治运动中极力整他、打他的人，对平时找“借口”恶

狠打击他的人，不仅以宽宏的心胸待之，而且在事后对整过他、打击过他的人，若有事求助于他，他并不介意以往，总是尽力予以相助和支持。他以德报怨的许多事例在武汉大学和国内学术界传为美谈。

他温良谦和，平易近人。即使对素不相识之人，若有求于他，他也乐于伸出援手。2002年，《田长霖传奇》的作者裴高才给从未谋面的陶德麟打电话，请求他为著作写序。没想到陶德麟满口应允，并且在一周后写就了一篇文情并茂的序言，还寄去了田长霖访问武汉大学的两张珍贵照片。裴高才事后才知，陶德麟当时正在病中，是在病床上完成序言的。听闻陶德麟逝世消息后，裴高才专门在《湖北日报》撰文回忆此事，颂赞其风范。

他做事认真，细致负责。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陶德麟同志与党政领导班子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在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和后勤管理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使武汉大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了通过国家“211工程”预审，他领导全校师生，克服重重困难，大力整治校内环境，搬迁校外单位和社会居民，为武汉大学顺利通过教育部的“211部门预审”，成为第一批“211工程”建设高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武汉大学的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他事必躬亲、亲历亲为、身先士卒的形象永久地留在了武大师生的心目中。在退出领导岗位后，他仍然不遗余力地支持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俊萍回忆道，2008年底，为了迎接国家对985项目实施情况的检查和验收，她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基地领导小组副组长负责收集基地专家的相关成果，注意到陶德麟同志每次都是亲自整理、提交各项材料，并且每次提交的材料都是最及时、最合乎规范的。这让她为其认真做事的态度和良好的工作习惯所折服。

三、业精善学功底深，一生勤勉，砥砺耕耘治学之路

学高为师，教师既要做“人师”，也要做“经师”。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强调教师的专业素养，要求老师“始终处于学习状态，站在知识发展前沿，刻苦钻研、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拓展、提高自己”。陶德麟同志潜心治教，乐思善学，排除万难，潜心学术，坚持党和国家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学术选择，把党和国家建设中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当作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在理论创新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

“文化大革命”前，陶德麟除协助李达撰写论著外，还在哲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撰文批评当时被视为权威著作的苏联罗森塔尔、尤金所著《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条目释文的错误，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后来《简明哲学辞典》作者也接受批评并作了改正。此后10年中，他先后在《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30篇哲学论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陶德麟同志重返理论战线，在繁重的行政事务之余，仍然挤出时间苦读苦学。在理论研究上，他从不吃“老本”，总是与时俱进充实新内容，而且还积极涉猎和关注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的进展。他的同事挚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朱传棨至今仍记得他苦学英语的往事。1986年底，他们一同乘坐火车去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陶德麟同志因乘火车睡不着觉，就取出小本子背诵英语单词。就是凭着这股刻苦劲头，他在短时间内恢复和提高了英语水平，很快适应了国际学术交流。2001年，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他不仅写好英文发言稿，而且在会上以清晰流利的口语作了题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交流》的主题演讲，受到与会的美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们的称赞。大会发言时，他敏锐地发现了会场翻译人员的常识性错误，还出人意料地承担了全场的翻译工作，震惊了全场的中外学者。

陶德麟同志对自然科学新发展的学习和掌握，也受到学界同行们的称赞。他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在当代有所发

展，不能不与当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这不仅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的结晶，而且因为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传统概念、范畴有所突破，需要作出新的概括。为此，他特别关注量子力学等领域的新发展，并进行了具体阐述。他的这一见解得到了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邢贲思等同志的肯定和认可。

凭着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态度，陶德麟同志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断探索，成果迭出，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陶德麟同志在继续深化对真理和真理标准问题探索的同时，就“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的关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社会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及实现途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成就斐然。

进入21世纪，陶德麟同志虽年届古稀，但仍然文思敏捷，笔耕不辍，论著迭出，尤其是在继续推进李达所参与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问题方面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大量心血。

坚实的理论功底，宽阔的学术视野，敏锐的问题意识，使得陶德麟同志在指导学生时游刃有余。他的博士生、汉江师范学院院长杨鲜兰教授回忆道，她在博士一年级时经常向陶老师汇报研究想法，不断更换博士论文选题，但是，每次陶老师听后，都会顺着她说的主题来分析研究思路，指引方向，“好像老师什么都知道，无所不能”。通过这样的指导，她逐步确定了研究主题，完成了博士论文。后来，轮到她指导博士论文时，她才真正意识到陶老师这一做法的高明。

四、敬业爱生仁者心，一生杏坛，俯身哺育栋梁之才

从字面上看，教育无非是教书育人；从长远来看，教书育人离不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对学生的仁爱。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说，“做好老师，要有仁爱之心。教育是一门‘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陶德麟同志献身教育事业逾六十年，怀着一颗仁者之心，真正做到了敬业爱生。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家，陶德麟同志向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教育和研究。从教以来，他长期坚守在课堂教学的第一线，坚持为本科生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27岁时，他就开始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本科生和全校研究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还应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之聘，讲授《实践论》《矛盾论》，听众达数万人，受到热烈欢迎。很多听过课的学生都赞誉他讲课深入浅出、条理清晰，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来阐述深奥的哲理，深受听众的喜爱。到了晚年，他还领衔申报了国家“985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基地——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为武汉大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搭建了新的更高的发展平台。

在教育实践中，他既精心授业解惑，又倾力传道育人，注重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与学生共同探讨，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从不强加于人。在专题研讨过程中，他总是与学生共同探讨问题，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并且对各种不同的、即使与他本人根本相左的持之有据的学术观点都持开放、包容和欢迎的态度。他的博士生、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汪信砚在读博期间，曾在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提出了与他很不相同的学术见解。当时有人跑去向他“告状”，说汪信砚发表与导师不同的学术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是陶德麟同志严肃地批评了那位“告状”者，反而对汪信砚进行了肯定和鼓励。

从教多年，陶德麟同志对学生宽严有度，听他的教诲如沐春风。对待学生的论文，他向来是一丝不苟，细致严谨。

在年逾古稀之时，他仍然逐字逐句地修改学生的论文初稿，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

长期以来，每逢博士生入学面试、开题报告、综合考核或论文答辩，即使再忙，即使是近年来年事已高，陶德麟同志也都尽力参加，并且总是提前到达，往往比别的年轻教师到达还要早。只要有他参加，很多已毕业多年的学生也会瞅准机会前来旁听，因为大家都特别想听陶老师充满人生智慧的亲切谈话。

陶德麟反复跟同事说，对学生要多多鼓励，“他们写的文章有一丁点值得肯定的地方，就要充分地加以肯定；有一丁点创新的地方，就要充分地给予鼓励。不要一味地批评。”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陶德麟的首届博士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如是感叹。

2018年11月，陶德麟同志从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的岗位上光荣退休。不过，他退而不休，拖着老病之躯，经常在病榻上指导博士生的毕业论文。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在医院打电话关心博士生崔继新的论文进展情况，安排后续的论文指导工作。

对本专业以外的学生，他一样爱才。1997年，湖南考生李若晖报考武大中文系古汉语专业硕士。这位年轻人在古汉语方面发表了数篇突破陈说、引发关注的论文，但外语未考过线。得知此事，已卸任校长职务的陶德麟同志专门写信给学校负责人，力主破格录取：“若囿于陈规，失之交臂，是瞽于识才也……破常规，排万难，断然录取，精心培植，俾成大器，则武大幸甚，学术幸甚！”李若晖终于圆梦，后又考取北大博士，现已是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稿件来源：教育部网站 编辑：陈丽霞）

【新华每日电讯】让哲学回到“地上”，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追忆著名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教授

刚过小满几日，陶德麟先生去世的消息如同武汉闷热天气一般让人感到窒息，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的师生们无不悲痛。

是夜，一场暴雨不期而至，倾泻在珞珈山郁郁葱葱的树木丛中，仿佛苍天挥泪，送别这位学问大家。

他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杰出代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是他一生的追求。

1978年，他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投入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在克服重重阻挠后应邀参加全国真理标准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

他发表系列论文，系统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两个凡是”，在学界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为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做出了突出的理论贡献。

他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培养学生必须使他们各有特点、各展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凡和他交往的人，无不称赞其大师风范、宽仁大度、高风亮节、平易近人。在他的身上，展现着一位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

他是武汉大学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他是航行于浩渺无际的真理海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舵手。

5月24日，陶德麟先生因病在武汉去世，享年89岁，珞珈山上痛失一位智慧长者。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一名学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来不觉得有重任在肩。直到陶老师病重，才感到自己还有一份责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和学习，已有30多年。

何萍告诉记者，陶老师身体一直都很康健，经常通宵达旦写作，直到近五年患上慢阻肺后，才有了住院治疗的历史。何萍原准备元旦后去医院探望陶老师。可是，新冠疫情的到来，让她无法成行，只与老师微信视频过几次。

何萍说，陶老师乐观积极，这次新冠疫情来袭，老师在医院里也很关心战“疫”进展。当他得知全国的疫情特别是武汉的疫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时，非常高兴。3月18日，陶老师在学院群里发了一段自拍视频。

“亲人们，在这次抗击凶恶的新病毒的时候，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大获全胜啊，人人都是胜利者。”在视频里，这位89岁的老人像一名不屈的战士，满面笑容、一脸坚定。

陶老师去世的噩耗传来，在悲痛之余，何萍向记者回忆起去年8月2日、3日的两次面谈经历，“没想到这竟成了陶老师留给我的一份珍贵的学术遗嘱。”何萍说。

去年8月2日上午，何萍到陶老师家中汇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丛书》出版的事宜，当时陶老师尽管在吸氧，但是头脑清晰。交谈之中，两人谈到学术界对20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些误解。关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这一段历史，如果再不清理出来，就再也无法还原它的真相。

两人都认为现在的青年学者接受的都是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简单地等同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观念。这种观念阻碍了青年学者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

第二天，陶德麟再次叫何萍来到家中，明确提出希望何萍能够将这段历史清理出来，给日后人们科学合理地评价这段历史提供事实依据。

“就在那一瞬间，我有了一种使命感。”何萍说，当时自己赶快打开笔记本，准备记录，同时拿出手机进行录音。陶老师一边吸氧，一边讲述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缘起、主导思想及编写过程，讲述当时的各种思想争论，以及成书的情况，并提供了搜集资料的线索。

何萍回忆，当时，陶老师一口气讲了近两个小时。老先生头脑冷静清晰，对文本熟稔于心，对历史信手拈来，令人敬佩。

何萍与同事李维武两人一起为陶德麟先生写了一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也是对先生一生工作的写照：“读实践论释实践论在实践论中发现哲学真理，讲中国化写中国化在中国化中阐明马列主义。”

在武大哲学学院副院长李佃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是陶德麟先生一生的追求，他始终致力于以清楚明晰的语言表述复杂的哲学问题，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说中国人民听得懂的话。

思深行范、追寻真理

一生追寻真理，矢志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著作等身，影响深远。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陶德麟先生的一致评价。

武汉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年过九旬的朱传荣，用手机微信发给记者一篇文章，悼念“共历风霜，情同手足”的老友陶德麟。老先生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敲出全文，饱含深情地回忆自己与陶德麟的一生交集。

朱传荣写道，陶德麟在年轻时就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科学性，勇于批评权威的片面性。记得1956年初，在《哲学研究》上看到陶德麟批评苏联哲学权威罗森塔尔、

尤金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的文章，让朱传荣感触很大，并深深记住了陶德麟这个大名。

朱传荣回忆说，当时我国在各行各业请苏联专家做指导的形势下，25岁的陶德麟敢于公开发表文章批评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少年意气风发，一时引人注目。

在朱传荣看来，陶德麟毕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既作为人类谋幸福的科学真理去追求，又作为党的重大事业去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做到了真信、真学和真用的要求。

陶德麟作为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不仅执笔完成了《唯物辩证法大纲》的写作和出版，也协助李达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即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基础理论与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并重的学术研究传统和踏实的优良学风。

风云激荡，历史转折的关头，总不乏勇敢站出来的英雄人物。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邀请陶德麟出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理论研讨会。陶德麟与朱传荣一同赴北京参加研讨会。

朱传荣告诉记者，在小组讨论中，两人还向新华社记者谈了毛泽东给李达的三封信的内容。为保证毛泽东写给李达的三封信在《哲学研究》上刊出，两人还做了一些排除干扰的工作，可以说，在这场彻底批判两个“凡是”、实现理论上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陶德麟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到武汉后，陶德麟受邀参与全省关于真理实践标准的大讨论，还撰文解答“唯一”的疑难。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疑问。

《哲学研究》主编同朱传荣商议，请陶德麟撰文解答。这样，陶德麟下了很大功夫写出《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哲

学研究》1981年第1期发表后，学界一致认为，陶德麟的文章从理论上彻底解答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的疑难。

自此，47岁的陶德麟，从学理上有力批驳了“两个凡是”，为破除思想迷信、澄清理论是非做出了突出贡献，以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实践派”，蜚声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

陶德麟敢于追求真理、勇于发声，也与他青年时代曾长期担任李达的学术助手有关。他对李达的有关著述和思想有着独到而深刻的体悟和理解，而李达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做出重大贡献，曾写下代表作《〈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曾被毛泽东赞誉为“极好”，早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经典。

现任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驻院研究员李维武认为，陶德麟在李达思想影响下，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开始向干部群众作包括讲解《实践论》在内的哲学辅导报告，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阐释方式。陶德麟的《〈实践论〉浅释》，就是他在半个多世纪里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工作的结晶。

“解释性的通俗读物，既要注意学理阐述的精确性，不能违背原文的本意、有损原文的理论深度，尤其不能为了片面追求通俗而陷于庸俗；又要注意行文的晓畅生动，力戒艰深晦涩，使广大干部和青年学生易于看懂，乐于接受。”这是陶德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通俗化阐释的基本原则。

朱传荣说，综观陶德麟在不同时期研究的课题和学术成果，都富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感，都是回答当时理论研讨中的诘难问题和理论原则是非不清的重要问题。它不仅具有一般意义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而且直接推动了理论研究的进展，巩固和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使之成为现实实践和人们行动的向导。

作为何萍的学生，李佃来告诉记者，回忆起“师爷”陶先生，老先生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熟稔在心，对问题

的把握更是深刻，还特别注重结合中国历史实际情况来把握问题。陶先生写了不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作，强调讲马克思主义语言不应晦涩，要多用自己的语言，他特别反对教条晦涩。

陶德麟先生的学生们都受到他的影响，因为陶德麟反复强调良好学风和文风的重要性。

哲学是从“地上”升到“天上”的，我们应当让她从“天上”回到“地上”来。这是陶德麟给学生——汉江师范学院院长杨鲜兰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

陶德麟告诉杨鲜兰，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哲学味”，而把哲学论文写得艰深晦涩，让人看了不知所云。一篇文章有没有“哲学味”，在于文章论述的是不是哲学问题，有没有哲学思想，而不在于文字上是否艰深难解。

宗师典范，谦谦君子

李佃来曾经为生病后的陶德麟送过三年书信，多了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让李佃来对老先生有了更多的观察。在李佃来看来，任何一个和老先生第一次接触的人，都很诧异这位大学者竟然一点儿也不高冷，而是非常平易近人。陶德麟会认真询问每一位新同事，哪怕是会议上遇到的一个新人，都会认真记下他的名字。

“80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周可，自从孩子出生后，每次去陶先生家，老先生都会关切地询问宝宝的生长发育情况，还颇有兴趣地谈起自己小时候的情形。

周可感慨地说，陶先生常说时下的评价体系给了年轻人太大的压力，逼得他们铆足劲早出成果、多出成果。所以，每次周可帮他解决电脑方面的小问题时，陶先生总是满怀歉意，觉得占用了周可太多时间。

朱传荣至今记得1958年8月从北京大学来武汉大学报到后与陶德麟初次会面的情景。陶德麟年过八旬，还能说出两人初次会面时，朱传荣穿的衣服颜色和式样。

在“文化大革命”中，陶德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蹲过牛棚、当过猪倌、做过炊事员，甚至遭受过错误的批斗。后来，他走上武汉大学主要领导岗位，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权对“整”过他的人打击报复。相反，他经常“以德报怨”，关心和帮助“整”他的人以及他们子女的学习和工作。

“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武汉大学校训，就是陶德麟担任校长时拟定的。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他团结全校师生员工克服各种困难，在教学、科研、队伍建设和后勤管理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武汉大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许正是年轻时的丰富经历，更加促成陶德麟成为一名无比坚强的人、一个很有定力的人。无论在多么艰苦的环境下，他都有一颗坚强乐观的心。

朱传荣说，陶德麟年近古稀仍抓时间苦读苦学的精神，令人起敬。在理论研究上，他从不吃“老本”，总是与时俱进充实新内容，而且还积极涉猎和关注其他学科的学术研究进展。

1986年底，朱传荣和陶德麟一同乘火车去广州参加学术研讨会，陶德麟因乘火车睡不着觉，就取出小本子背诵英语单词，为适应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他硬是在短时间内恢复和提高了英语水平。在一次“马克思主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以清晰流利的口语做了题为《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交流》的主题演讲，受到与会的美国、英国、意大利、以色列、日本等国家的学者们的称赞。

杨鲜兰至今保存着一张导师陶德麟先生手写的便条。

原来，有一次杨鲜兰约好要到导师家里汇报学习情况，但老师临时有事，又无法及时联系，陶德麟就用毛笔写了一张便条让师母转给杨鲜兰。导师用语精练，书法漂亮，那也是杨鲜兰第一次见到陶先生的字。

后来杨鲜兰读了老师的一本题为《学步履痕》的著作，才明白老师语言、文字、文章功力的厚重积累。

在李佃来看来，陶德麟不仅古文、书法、诗歌有功底，还会自拉弹唱京戏，更是一位不排斥新鲜事物的老人，80多岁依然勤奋，用电脑打字，笔耕不辍。“古人说‘不知老之将至’，我是明知‘老之已至’，但有生之年不敢懈怠而已。”陶德麟曾经笑言。

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郭继海，对导师陶德麟作为教育家把学生放在第一位的态度，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印象最深。

晚年的陶德麟曾经自谦写道，“我深感自己是个平庸的探索者，在浩瀚无际的哲学大海里乘桴而行。而今垂垂老矣，还常常自觉如童稚之无知。然而我并不怨悔。”

陶熔鼓铸，德厚流光，麟角凤皇。一代宗师，乘桴远去，却留下无尽光芒。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本网编辑：陈丽霞）

“我还愿意做一名哲学教师”

——追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武汉大学原校长陶德麟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肖珊

武大人无论走到哪里，有八个字常在心头回响：自强，弘毅，求是，拓新。

这八字校训是在上世纪90年代，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陶德麟担任校长时拟定的。陶德麟掌校时期，秉承这一校训精神的武大师生团结一心，砥砺奋进，学校各方面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武大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这只是陶德麟激荡人生的一个截面。他人生的每个节点都充溢着胆识与锐气，体现出坚如磐石的信仰与执着。从青年时期求学开始，他的一生都扎根于珞珈山，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把一生心血奉献给了党的理论事业和教育事业。

5月24日，陶德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这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生前曾说过：“今生能做的就是和恩师李达一样，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如果有来生，我还愿意做一名哲学教师。”

执着于真理，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

陶德麟与哲学结缘，离不开一个人：李达。1952年，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亲自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陶德麟是大四的学生，奉派为李达整理讲课记录，成为李达的得力助手和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和研究作为终身职业。

1961年，李达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指定由陶德麟执笔。1965年冬，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

“文革”结束后，陶德麟怀着满腔热诚，迅速投身党的理论事业。1978年，他在真理标准讨论会上作《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专题发言，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在同年第10期《哲学研究》上发表。

武大哲学系毕业生、武大教授骆郁廷说：“陶先生追随真理之心不曾动摇。他的信仰从不因客观环境的变化、别人的闲言碎语甚至打击而改变。这种因真理而生的浩然之气，使他敢于为国家、为人民、为时代发声。”

执着于创新，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从1953年留校执教到2018年从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的岗位上退休，陶德麟在武汉大学工作长达65年。几十年来，陶德麟倾心于联系当代实际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黑格尔说过，‘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教给哲学说中国话。”陶德麟认为，正因为八十多年来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

在陶德麟的学生、武大哲学学院教授汪信砚看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陶德麟先生学术研究的根本志趣，他的学术探讨无不体现着这一点。”

学科的发展往往是几代人积累而成。陶德麟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创建者，主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建设长达40余年，带动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学术人才迅速成长。

武大哲学学院教授何萍是陶德麟的第一届博士研究生，1988年毕业留校任教，一直在陶德麟身边工作学习，已有30多年。

何萍回忆起，去年在恩师家里，陶德麟忧心地说，学术界对 20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一些误解，如果不清理出来，就再也无法还原真相。“他一边吸氧，一边讲述编写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缘起、主导思想及编写过程，并提供了搜集资料的线索。”这一幕，激励着何萍矢志不移地完成导师的遗愿。

执着于责任和爱，发掘学生长处因材施教

陶德麟喜欢和学生门在一起，几十年来一直坚守在教学前线。作为教育者的陶德麟，留给后学的印象：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

汪信砚讲过一个故事。1982 年，他读大三，与几个同学饭后散步，其中一位提议：“陶先生是我们系最有名的老师，我们听过他的课，但没和他交谈过，不如现在去他家请教吧。”于是，几个年轻人敲开了陶德麟的门。

陶德麟热情地将他们迎进门。师生几人在陶德麟家狭小的客厅里促膝长谈，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这段“贸然拜访”的经历促成了后来几十年的师徒深情。

陶德麟总是强调“不拘一格育人才”。他说：“人才不是工业产品，不能按统一的工艺流程和统一的规格模式批量生产，千人一面，必须因材施教，使他们各有个性、各有所长，千姿百态，群星灿烂。”

“陶先生很保护学生，从不给我们贴标签，从未让我们尴尬，却恰如其分地促人勤学自省。当我成为教师之后，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陶德麟的首届博士生、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冯平如是感叹。

来源：中国教育报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的他走了

楚天都市报记者 柯称 通讯员 吴江龙

哲学不是高悬在空中的太阳，一定要扎根大地；哲学家不能脱离人民，一定要关心人的命运。”5月24日下午，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德麟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武汉逝世，享年89岁。

1978年，47岁的陶德麟教授奋力投入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顶风”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

陶德麟曾说，今生能做的就是和恩师李达一样，致力于“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如果有来生，他还愿意做一名哲学教师。

师承李达

继承胆识与锐气

陶德麟祖籍湖北黄冈，1931年出生于上海。1949年至1953年在武汉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留校担任时任校长李达的学术研究助手，历任哲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系主任，1992年至1997年任武汉大学校长。

1953年，是李达就任武汉大学校长的第二个年头。读经济而非马哲的青年陶德麟，走进李达的屋里，经过一番长谈，成为这位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者的得力助手。

“搞马克思主义的人要有坚持真理的品格，不能像摆摊的小贩，天晴把摊子摆出来，下雨就收摊子。”恩师李达的这句话，影响了陶德麟的一生。

昨日，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院长助理吴昕炜回忆，陶老在不同场合多次对后辈说起这段话，也曾用这句话教育过自己，让吴昕炜终身难忘。

1955年夏，陶德麟写了题为《关于“矛盾同一性”的一点意见》的论文，立时引起轩然大波。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篇“大胆”的文章——批判锋芒直指罗森塔尔、尤金合著的《简明哲学辞典》，两位作者皆是苏联的科学院院士。在那个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此举无疑是挑战权威。这是陶德麟首次在学术界引发关注。此后他一生学术探索硕果累累、成就卓著，先后出版著作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笔有雷鸣道不孤”，这是多年老友、哲学家陈先达教授对他的评价。武汉大学在官方讣告中评价陶德麟——充分展现了一位当代中国著名哲学家关注国是民瘼、心系民族兴亡的担当意识、爱智求真与忧国忧民高度统一的思想境界、“为万世开太平”的理论情怀以及为追求真理而“九死无悔”的探索精神。

历经劫难

投入真理标准大讨论

1956年，25岁的陶德麟登上讲台，很快得到了学生们的喜爱。1961年，一项沉甸甸的使命落到了陶德麟肩上——协助李达，编写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1965年10月，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完成。然而，突如其来的厄运阻住了前路。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李达遭到残酷批斗，两个多月后含冤去世。陶德麟也在劫难逃，陷入了长达八年的批斗、侮辱和劳动改造，几次遇险，命悬一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成为阻碍拨乱反正的政治栅栏。1977年，陶先生应邀赴北京参加纪念《实践论》和《矛盾论》发表40周年的理论讨论会，与理论界的一批同志达成了一项重要共识：“文革”的悲剧持续十年之久，主要是由于在真理标准问题上以“语录标准”和“权力标准”取代实践标准。不彻底摧毁这一哲学基础，恢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根本原理，实现拨乱反正将寸步难移。

《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率先鸣炮之后，197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理论与实践问题研讨会”，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陶德麟应邀作了大会专题发言——《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批驳了“两个凡是”，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陶德麟还在《哲学研究》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并在全国作相关学术报告20余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了令人信服的科学论证。

“当时，大家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基本接受，但对‘唯一’二字仍有怀疑。老陶就是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工夫，从理论上证明了真理标准的唯一性。”陶德麟的“老战友”、武大哲学系教授朱传荣感慨。

思想独立

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

改革开放后，“我们还需要马克思吗？”的论调曾一度出现，陶德麟接连写下十余篇文章，批驳谬误，激浊扬清。陶德麟说：“黑格尔说过，‘我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我们也必须‘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问题，按自己的‘坐标’研究问题，以简明易懂的语言陈述问题。”

陶德麟认为，中国道路是中国人民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自己“走”出来的。因此，他倾力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文革”结束后，陶德麟等人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编纂出版了四卷本《李达文集》，系统地探讨了李达先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杰出贡献，开启了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陶先生善于用人们喜闻乐见的语言阐释深奥道理，他多次尖锐地批评“用汉字写洋文”、艰深晦涩、故弄玄虚的文风是一种病态。他曾说，正因为我们致力于教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中国话，以新的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才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才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

爱生如子

当校长一天工作 14 小时

陶德麟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家。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是他留给后学的印象。

吴昕炜回忆，7年前他刚进武大时，对学生非常严厉。陶德麟就批评他，老师对学生不能太苛刻，不能一味批评，要想办法多鼓励，一步步来。

陶德麟当校长时，就是出了名的爱学生。家属区停电、年轻教师评职称、学生宿舍漏雨、退休教师要房子……这些繁琐细碎的小事，他都要一管到底，常常一天工作 14 个小时。

在教学中，他一方面要求学生不要成为老师的“复制品”；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学风严谨，言必有据。他批阅论文的意见有时长达上万字，学生论文达不到合格水平，决不允许提交答辩。

“我当年论文修改到第三稿时，先生正住院手术，行动尤其说话很不便。我以为他会放宽些标准，不料，先生躺在病床上，照样认认真真地看，仔仔细细地改，毫不苟简。”山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倪勇曾回忆。

2004年，陶德麟被遴选为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2018年11月光荣退休。

笔耕不辍

一边吸氧一边讨论学术

陶德麟的得意门生之一，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萍告诉记者，陶德麟一生奉献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近两年身体状况不佳，仍笔耕不辍，还出版了两部著作。何萍教授回忆了去年8月，她和恩师的最后一次面对面交流。

“他有慢阻肺的老毛病，在家中要经常吸氧，那次会面他戴着氧气管，和我谈了两个多小时。”何萍教授说，陶老师讲到我们上世纪50年代就在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那段历史被误解了，他希望学生能接着研究下去，让事实说话。

何萍教授说，疫情期间，陶老也十分关注抗疫的进展，曾打电话跟她说起，自己的外孙女成为抗疫志愿者，全家都为她感到自豪。前阵子，陶老看到武汉疫情好转，还在学院微信群里发了一段视频说，“这是武汉的胜利，更是全党、全国的胜利，是我们每个人的胜利。”

“老师真是走得突然。当时那段视频中，老先生还中气十足，显得非常精神。”昨晚，吴昕炜接受采访时连说了几声“遗憾”——去年下半年，他曾约老师拍一段采访视频，但因为老师身体抱恙未能如愿。吴昕炜表示，陶老的后辈会继续他的研究。

部分内容综合自《光明日报》《湖北日报》

来源：楚天都市报

爱智求真与现实关怀的高度统一

——陶德麟哲学思想研究

作者：汪信砚《光明日报》（2020年06月01日15版）

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武汉大学原校长、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陶德麟先生于2020年5月24日在武汉逝世，永远离开了我们，永远离开了他所钟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事业。

陶德麟，字佛元，笔名芑原，1931年10月31日生于上海，祖籍湖北黄冈。195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并留校任教，历任哲学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校长。陶德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最有影响的前辈学人之一，被誉为德高学范的“学界泰斗”和“哲学宗师”。

哲学探索之路

陶德麟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幼年未上小学，在家由父母和学者陈炳文、杨相霖先生授课，学会了文言文和旧体诗词写作，表现出过人的天赋，16岁时就能写一手老练的文言文和古典诗词，中学期间研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毛泽东同志的《辩证法唯物论提纲》等著作，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49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除专业学习外，他也选修了一些哲学类课程，自学了《资本论》第1卷。1953年大学毕业后，他留校任哲学系教师，并兼任李达的科研助手达13年之久。几十年后他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李达老师是我的恩师和引路人。”

“文化大革命”前，陶德麟除协助李达同时撰写论著外，还在哲学系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在《哲学研究》1956年第2期上撰文批评当时被视为权威著作的苏联罗森塔尔、尤

金所著《简明哲学辞典》中“同一性”条目释文的错误，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后来《简明哲学辞典》作者也接受批评并作了改正。此后10年中，他先后在《红旗》《人民日报》《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上发表了30篇哲学论文，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61年8月，李达接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的任务，指定由陶德麟执笔。在李达指导下，经过4年努力，他于1965年冬完成了38万字的上卷《唯物辩证法》送审稿。正当他继续编撰下卷《唯物史观》时，“文化大革命”爆发，陶德麟被打成“黑帮分子”，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达8年之久。

1978年，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反对“两个凡是”的理论斗争，在克服重重阻挠后应邀参加全国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并作大会发言。在讨论会期间，他向中国社科院提供了毛泽东同志当年给李达的三封论及理论问题的信，经中国社科院报请党中央批准在《哲学研究》首次发表，对当时促进理论是非的澄清起了重大作用。尔后，他在《哲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系列论文，系统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驳“两个凡是”，在学界内外产生重大影响，为我国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作出了突出理论贡献。与此同时，他遵李达遗嘱修订《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上卷，以《唯物辩证法大纲》的书名出版，被认为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达到的最高水平；他主持编纂出版了四卷本《李达文集》，并较系统地探讨了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中的杰出贡献，把李达思想研究推进了一大步；他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总论”和“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副主编，撰写了多项重要条目释文；他还主持编写了多种马克

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80年代以后，陶德麟在继续深化对真理和真理标准问题探索的同时，就“双百”方针的理论基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的关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社会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论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及实现途径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研究，成就斐然。

进入21世纪以来，陶德麟虽年届古稀，但仍然文思敏捷，笔耕不辍，论著迭出，尤其是在继续推进李达所参与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学理根据和方法论问题方面倾注了满腔热情和大量心血。

陶德麟的学术探索硕果累累、成就卓著，先后出版由他执笔并修订的《唯物辩证法大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当代哲学问题探索》《哲学的现实与现实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研究》《陶德麟文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与真理——认识论研究》等著作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他的这些论著不仅以其精深的学理研究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而且充分展现了一位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心系民族兴亡的担当意识、“为万世开太平”的理论情怀以及为追求真理而不懈探索的精神品格。

哲学思想贡献

陶德麟继承和发扬了李达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研究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把研究重心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既爱智求真又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实现了多方面的理论创新。

对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阻碍着拨乱反正，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率先鸣炮之后，1978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全国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哲学讨论会”，陶德麟应邀作了题为《关于真理标准的几个问题》的大会发言，并在《哲学研究》1978年第10期发表同名文章，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旗帜鲜明地批驳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论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破除“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实践标准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

当时有些学者虽然也反对“两个凡是”，但在理论上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尚存有疑虑。有人认为逻辑证明也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人认为真理标准应当是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实践。这使陶德麟深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不是“常识”，而是需要从学理上周密论证的命题。为此，他又连续发表了4篇论文。

在《逻辑证明与真理标准》一文中，为了避免因名词含义歧异而产生的假争论，陶德麟首先界定了三个关键词即“真理”“逻辑”和“逻辑证明”：“真理”是指认识与对象的符合；“逻辑”是指由前提、推理形式和结论三个要素组成的演绎推理；“逻辑证明”是演绎推理的一种运用。由此，他首先明确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是“作为演绎推理的逻辑证明是不是判定认识与对象符合的标准”，然后严密地论证了如下观点：（1）作为前提的命题无论是公理、定理、定

义还是经验命题，它们的真理性都不可能由逻辑来证明。(2) 推理形式的正确性即有效性也不可能由逻辑来证明，因为这种证明本身不能不运用推理形式，而这种推理形式的正确性同样又需要证明，结果只能是循环证明或无穷后退。(3) 正确的推理形式可以归结为蕴涵式的重言式即永真式 (tautology)，它能“管”的只是前提与结论之间的逻辑蕴含关系，而不是前提和结论是否与对象符合。数学推导所证明的也是公理与定理、定理与定理间的逻辑关系，而公理和定理是否符合客观对象恰恰是数学推导不能证明的。(4) 由真前提合乎逻辑地推出真结论也不能说明逻辑证明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为前提的真只是一定范围内的真，而当实践超出了这一范围时结论就未必真，这在科学史上是极为常见的。(5) 逻辑证明在提供新知识、组织实践检验、确定实践结果的意义等方面有不可缺少和不可代替的作用，但在确定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这一点上，“判决”者并不是逻辑而是实践。由此，该文令人信服地阐明了逻辑证明为什么不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在《认识的对象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吗？》一文中，他以对话体的形式细致地论证了如下论点：(1) 以认识对象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等于说“要判定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就看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因而不过是同义语反复。(2) 以认识对象为检验认识的标准无法操作，因为认识无法直接与客观对象相对照。如果通过观察去“对照”，就等于把原来的认识过程重演一遍，仍然不能解决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的问题。(3) 要检验某一认识与对象是否符合，只能根据这一认识设计某种方案，设定预期的结果，然后付诸实践，造成一定的客观结果，再把这一结果与预期的结果相对照，如果两者符合，这一认识与它所反映的对象相符合才得到了证实，因此，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不是认识对象本身，而是实践的结果。

在《实践怎样检验认识》一文中，他以科学史为背景，把命题区分为“逻辑命题”和“实在命题”两大类（前者可分为分析命题和矛盾命题，后者则可分为知觉命题和普遍命题），对如何检验各类命题的逻辑机理做了模型化的分析，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标准原理进一步精确化并具有了可操作性。

在《真理阶级性讨论中的一个方法问题》一文中，他认为，虽然批驳“一切真理都有阶级性”的说法完全必要，但如何批驳才能击中要害却有一个方法问题，特别是首先应当弄清“一切真理都有阶级性”这句话中“真理”一词的所指。

“真理”是 truth 的汉译，它有两种不同的含义：含义 I 是指“理论的真”，含义 II 则是指“真的理论”。这两种含义不可混同，正如不可把“石的坚”与“坚的石”混为一谈一样。如果取含义 I，则“真”和“阶级性”是理论的不同属性，不能说一种属性具有另一种属性，正如可以说“石是坚的”和“石是白的”，却不能说“坚是白的”或“白是坚的”一样。在这种含义上，无论断言真理有没有阶级性都是没有意义的伪命题。如果取含义 II，则“一切真理都有阶级性”和“一切真理都没有阶级性”都是假命题。有的文章为了批驳“一切真理都有阶级性”，就肯定“一切真理都没有阶级性”，在方法上是不当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首先指出“文革”中流行的“一切真理都有阶级性”的命题指的是“真”有阶级性、它是一个伪命题，再来揭露这个伪命题在群众中的蛊惑作用。

对“双百”方针理论基础的时代思考

“双百”方针是思想文化领域的根本方针，是坚持真理问题上的实践标准必须遵循的方针。但陶德麟认为，在拨乱反正中仅仅强调“恢复”“双百”方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认为：“虽然‘双百’方针提出的初衷完全正确，可是后

来由于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估计发生了原则性的偏差，这个方针的理论基础实际上被修改了。它的理论基础已经基本上不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当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理论），而是被扭曲了、变形了的‘阶级斗争’理论，因而它的主要内容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是无法统一的。”为了恢复“双百”方针理论基础的本来面目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完善，他先后在《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等报刊上发表了系列论文，以确凿的事实、细致的分析和犀利的语言论证了这样一些重要观点：

第一，把“百家”归结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家”，把一切科学艺术的不同见解和争论都归结为阶级斗争，不符合思想史的事实，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

第二，精神世界的问题不可能用“专政”的办法解决。即使确是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也必须遵循思想斗争的特殊规律，即必须用说理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办法。“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专政”是完全错误的口号，这一口号不能为马克思主义赢得寸土，只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败坏。

第三，要正确地贯彻“双百”方针，就必须以认识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的理论（当然也包括意识形态的理论）为基础，对这一方针作重新解释。只有经过重新解释的“双百”方针才能真正成为促进科学艺术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方针。他还对今后如何切实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建议。正是由于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他关于“双百”方针的系列文章在理论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既有力地批驳了在真理面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没有平等可言的哲学教条，又维护了“双百”方针应有的科学含义，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作了极具意义的开路工作。

对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其与实践标准关系的阐释

198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论断，1992年又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断。对于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及实践标准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界有不同的解读。从1987年起，陶德麟先后发表了系列论文，就此阐述了如下精辟见解：

第一，三个“标准”的提出是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是哲学概括现实而又指导现实的体现。

第二，实践标准问题解决之后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仍有重大分歧，是因为实践标准并没有回答实践本身是否合理的功能。实践标准判定的是认识的真理性问题，生产力标准判定的是实践的合理性问题。虽然解决前一问题是解决后一问题的前提，但解决了前一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后一问题。以某一真理性的认识为依据引出的实践方案可以是多种多样、甚至截然相反的。如果以实践为标准去检验何种实践合理，则不仅是同义语反复，而且会得出无论什么实践都合理的荒谬结论。例如，根据对某些科学技术的真理性的认识，既可以制造治病救人的药品，也可以制造害人杀人的毒药。如果用实践去检验，这两种方案都可以“实现预期的目的”，因而都算得上是“合理”的。可见，检验实践的合理性需要另一种标准，这种标准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追求的目的不同，实践合理性的界说和判定标准也就不同。马克思主义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实践合理性的标准，首先需要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真理性的认识，同时还需要确立以解放全人类为最高理想的价值观，如果仅有前者而无后者是提不出这个标准的。肯定会有人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始终不同意这个标准，那也不必强求。

只要绝大多数人认同这个标准，社会就会形成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建设就会顺利得多。

第三，“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是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它不仅要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还要求从中引出的实践方案有合理的价值取向。只有同时做到了这两条，才算是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是在实践标准讨论之后还必须开展生产力标准讨论的理论原因。

第四，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经济效益标准。经济效益有局部和整体之分，有眼前和长远之分；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只需要讲求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要讲求社会效益。把生产力标准归结为经济效益标准，在理论上不准确，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消极后果，最终会导致对生产力本身的破坏。

第五，“三个有利于”标准并不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之外的另一套标准，但又不是对两者的复述或叠加，而是对两者的综合和发展。它是把认识的真理性原则和实践的合理性原则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原理作为整体贯通起来并与国际国内的具体形势结合起来的一种高度浓缩的表述。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两个标准就没有根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不能认为有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就不需要再讲前两个标准。然而，“三个有利于”标准又确实比前两个标准更进了一步，运用在改革实践中更好操作，更便于检查落实。

此外，他还对这三个“标准”与精神生产、道德原则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

对人道主义问题的辨察

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中，陶德麟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把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专有的旗帜不加分析地全盘否定，在理论

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导致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为人道主义正名乃至辩护都是必要的，但必须给予科学的解释；不加分析地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或者用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也同样不正确。1984年，他发表了《对两种历史观的一点理解》和《关于两种伦理原则的几个问题》两篇论文，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见解：

首先，人道主义是从一定的历史观基础上引申出来的伦理原则。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哲学基础的。抽象人性论的根本缺点在于它把人性视为脱离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于它不是用历史来解释人性而是用人性来解释历史。这种抽象的人性论实际上是把资产阶级的要求说成普遍人性，由此引申出来的人道主义原则也是资产阶级要求的反映。把这种人道主义界定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可以引申出人道主义原则，这是无产阶级的或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区别表现在四个方面：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为界限，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与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相一致；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用无差别的“人类之爱”来掩盖事实上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以承认阶级矛盾并以最终消灭阶级差别为归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以集体主义为核心；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很大的虚伪性，不可能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则是现实的，可以彻底实行。

再次，分清两种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不等于否认“共同人性”的存在。人类有利益差别乃至利益冲突，也有共同利益；有共同利益就有共同人性，它并不是空洞的概念。但共同人性只能寓于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具体人性之中，是具体人

性的共同点，不能脱离具体人性而独立存在，正如“水果”不能脱离桃杏梅梨等而独立存在一样。不能把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殊要求说成全人类的“共同人性”。

最后，分清两种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绝不等于否定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中巨大的历史进步性，也不等于否定它在当前实际生活中的积极作用。

他还强调，马克思主义者也必须举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并给予科学的解释，使之落到实处。

对道德原则问题的思索

针对改革开放中人们在道德原则上的困惑，陶德麟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表了多种论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承认有什么不依赖于物质生活条件的先天的抽象的道德原则，道德原则归根到底是从现实经济关系中吸取得来的。当然，由于社会发展是世代绵延的过程，因而每一时代的道德原则中都既有历史的积淀，又有未来的憧憬，既有本民族本地区文化传统的延伸，又有各民族各地区文化交融的影响，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表现为千差万别的形式。但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及由此决定的现实的经济关系，仍然是最深层、最顽强的左右道德原则的力量。一切其他因素或迟或早都不免要经过现实经济关系的筛选、过滤、折光、重组，被熔铸成与现实经济关系相适应的整体。不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应当服从某种道德原则，而是一切道德原则或迟或早都不得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他认为，根据我国的社会性质、经济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的道德原则仍然应当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但要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要科学地规定无产阶级道德原则的内容。对长期以来作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来宣传的东西要进行分析清理。有些确实是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应有的内容，现在也还要坚持；也有些是脱离实际的假大空的东西，甚至是封建意识或小生产者意识的变形，现在就应当摒弃。如果把过去宣传的道德原则不加分析地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的尺度，“势必把大量的改革措施判定为违背无产阶级道德的行为，而把符合传统习惯的某些阻碍改革的东西视为坚持无产阶级道德的模范”。

第二，要具体地应用无产阶级道德原则。无产阶级道德的一般原则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具体处境中都有其具体的内容，不能把一般概念当作公式往具体情况上套。

第三，要注意无产阶级道德本身还有层次之分。要区分对大多数人的要求和少数先进分子的要求，对先进分子也要区分一般情况下的要求和特殊情况下的要求。

第四，要注意现阶段并不只有无产阶级道德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无产阶级道德并不是现阶段唯一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道德，全人类的公共道德和其他阶级道德中的积极成分也是适应现阶段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第五，要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的道德遗产。道德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并不意味着不同阶级和不同时代的道德毫无共同之点，并不排斥继承和借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无产阶级道德必须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道德遗产，以丰富自己的内容。特别是中国几千年的道德遗产中有大量的优秀成分，应该成为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宝贵资源。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

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陶德麟学术研究的根本旨趣，他的学术探讨无不体现着这一致思旨趣。他认为，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已是客观事实，但国内外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仍然歧见很大，必须从学理上予以澄清。为此，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特别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问题的研究，出版和发表了系列论著，着重探讨了以下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他指出，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的观点不过是几十年前的老调重弹。这种观点曾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理由而甚嚣尘上，现在又以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起了变化为理由再度出现。这种观点一再强调时代和国情，可是它的谬误恰恰在于无视或曲解了时代和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正是由时代和中国国情决定的，过去如此，今天同样如此。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检验标准。他认为，检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得失不能用汉儒和清代朴学家注经的办法，以某个论断与某个文本是否符合为标准，而只能以实践的结果与实践方案的预期目的是否符合为标准，一句话，应当坚持实践标准而不是文本标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教条主义的根本区别。

三是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的历史主义原则。他强调说，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一定要把它放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进行具体分析。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才能得到正确理解，也才能从中提炼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

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角和视野。他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关键是要处理好世界化与本土化的关系。当前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首先要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其次，还要避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简单化、线性化的毛病，要看到这个过程

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其他外来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最后，在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就时，也要放宽视域，不仅要看到体现在著作中的理论成果，还要看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整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情操、行为方式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实际影响，看到它对重铸中华民族精神的实际作用。此外，还应关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和对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的研究。

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关系。他认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三者缺一不可，而它们的地位又不是平列的，其中，中国化是统领一切的总问题，它逻辑地蕴涵着其他两个方面，但其他两个方面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也需要作为问题来探讨。他还对大众化的内容、对象、方法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他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对现时代的中国大众“说中国话”，应当努力“做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篇大文章”“这正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也只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可能担当起这个责任”。

（作者：汪信砚，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